

观念读本

idea

20

大家西学

幽默二十讲

李 静 编

与其说幽默是一种语言艺术，不如说是一种心理素质

Humour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大家西学

Humour

幽默二十讲

李静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幽默二十讲 / 李静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7
(大家西学)

ISBN 978 - 7 - 201 - 06015 - 6

I. 幽… II. 李… III. 幽默 (美学) — 研究 — 西方国家 IV.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3113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丛书主编 何怀宏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幽默二十讲

编 者 李 静

责任编辑 章 桢

特约编辑 董曦阳

美术编辑 兰 馨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邮编: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4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6015 - 6

定 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总序

何怀宏

这套丛书是我们拟议中的“观念读本”之一种。拥有语言形式的思想观念是人猿揖别的一个标志，各民族、各文明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都对丰富人类的精神宝库作出了贡献，有必要互相参照。而当世界进入“现代”之际，甚至在商品、资本的全球大规模流通之前，观念的流动其实早已开始，乃至后来引发了世界性的激荡。在这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轫过程中，西方观念相比于其他文明的观念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的母邦中国在近一百多年中也发生了包括深刻的观念变革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故而对观念的关注是以中西为主。而无论中西古今，我们都将努力从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中遴选篇章。

对人的“思想”及其产品或可分离出三个要素或过程：一是个人思想的主观过程，包括思考、判断、分析、反省等；二是已经具有某种客观化形式以至载体的概念与理论；三是成为许多人头脑中的观念。我们这里所理解的“观念”是这样一些关键词，它已经不仅是思想家处理的“概念”，而是变成社会上流行的东西，被许多人支持或反对的东西。对“概念”的处理是需要一些特殊能力或训练的，而“观念”则是人人拥

有，虽然不一定能清楚系统地表达，甚至有时不一定被自身明确地意识，比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管有没有或有多大的独创性。这种“观念”的源头虽然还是在“概念”或者说“思想”，但它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是千百万人的思想。这一系列读本要处理的“观念”就是这样一些共享而非独享的思想。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耐人寻味的是，一个主要研究经济或者说物质的东西之运动的学者，却对思想观念的力量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当然，这可能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巨变时期。凯恩斯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观念对个人，对哪怕是无意识地接受了某种观念的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对政治家的影响；他还强调观念接受中的“时间”因素：观念从提出到接受可能是相当漫长的、隔代传递的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他看来还是倾向于思想观念支配着世界的观点。而韦伯的观点可能稍稍折中，他在《宗教与世界》中认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上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也就是说，直接的还是“利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人们如何理解这“利益”，或者说，这轨道往什么方向去，却决定于人们的观念，尤其是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于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是他们认为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当然，这里对“利益”的理解就必须采取极其宽泛的观点，它不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甚至也包括精神的“利益”。比方说，西方中世纪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就不是追求俗世的好处，而是彼岸的“永生”。但这样一来，“利

益”与“观念”就会容易混淆而不好区分。

影响我们的行为、活动和历史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制度，三是思想文化。而每类又可再分出两种。属于自然的两种：一是人类共居的地球，二是各民族、群体所居的特定地理环境。属于制度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制度，包括生产、生活、交换、分配等方式；二是政治制度，包括权力运作、法律、军事等机构和活动。属于思想的两种：一是比较稳定外化、为一个群体共有的文化、风俗、心灵习性，二是比较个人化、经常处在争论和辩驳之中的思想、观念、主义和理论。那么，这三类，或者更往细说，这六种哪一个对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具有更重大的影响？或按习用的话来说，是地球或者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或者政治，抑或人们的心态或者思想更具有“决定性”？

“地球决定论”一般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除非整个地球家园面临灾难乃至可能的毁灭，但我们在今天一些生态哲学中已经依稀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一些面向人类比较广阔和长远的文明和民族观察和思考的人们，也曾提出过“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在一个以经济为活动主轴的时代，比较盛行的是“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政治”乃至“军事决定论”则往往在传统书写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在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则不时还有“文化”或“国民性决定论”以至“思想观念的决定论”出现。但今天，我们也许应当首先审慎地思考“决定”这一概念本身，因为“决定”的含义本身就难以“决定”。也许一切都有赖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及对历史范围、时段、条件的规定。

人们只有吃饭才能生存，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这诚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但由此引出经济是决定性的结论却必须放到某些条件下才有效。从更为基本和长远的观点看，地球千百万年来决定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可能性，地理环境则构成对一个民族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的很难逾越的制约。人们如何生存、如何找饭吃要受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而从更高的观点或者虽然较短但却可能更为关键的时段看，吃饭并不是一切。政治常常是更直接、更有力，并有它自己的逻辑杠杆。而文化风俗

和国民性常常造成一种政治经济改革的“路径依赖”，至于观念，则无时无刻不在历史活动的主体——人那里发生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在某些“转折”或“革命”时期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对于美国革命，白修德甚至认为，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这个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这个观念就是《独立宣言》中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以及每个人追求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的权利。而拿破仑也谈到，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启蒙观念的结果。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说观念起了巨大的作用时，并不是说它起的都是好作用，或者说起了作用的概念都是正确的。推介《进步的概念》一书的比尔德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英国的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好成正比。”而吊诡的是，过度引申和扩张的单线“进步观念”可能也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样的观念：它最真实的成分往往不那么引人注意乃至显得无力，而它最有力的部分却是不那么正确或周全的。总之，我们不想夸大观念的力量，但它们的确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某些巨变的时期：这时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由于人们的想法变了，也就酿成了社会巨变，虽然这里也可以进一步追溯说人们的想法改变是其他条件变化累积的结果。不过，对学者和思想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更为关注思想观念，就像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1895年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但知识者自然也得常常警惕这种对思想观念的偏爱，警惕自己不要逾越某些界限。观念不仅在接受的个人那里常常是滞后的，它的社会结果是滞后的，对观念及其后果的认识也是滞后的。我们往往要通过一个观念的后果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这个观念。而除了时间的“中介”，我们还需注意作为人的“中介”，观念往往是通过少数、尤其是行动的少数而对多数人发生作用。企望由自身在当代即实现某种理想观念的“观念人”往往要在实践中碰壁。

所以，在这一系列观念的读本中，我们将特别注重时间、时段，注重历史。我们将试图回顾。柏拉图说一个人的“学习即回忆”，而一个民族的学习大概要更多地来自回顾，这种回顾也似乎更有可能，更有意义，也更容易着手。但我们将立足于现在来回顾，甚至于关照未来进行回顾。我们是在一个历史的巨变时期之后——但也可能还是在这之中——来回顾。的确，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即从观念的历史来回顾。但我们也意识到观念在一个历史巨变时期的特殊重要的力量。

这套丛书就是这样一种试图从观念回顾历史的初步尝试。现在放在大家面前的这些观念，诸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是一些曾经感动或激荡过远远不止一个民族的声音和文字。对于中国来说也许更是如此，它们有些在这片古老辽阔的大地上掀起过风暴，有些则是一直在对众多的人发生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的确，这些观念的来源虽然可以追溯到久远，其思想萌芽或雏形也可以在几乎所有民族和文明中发现，其意义有待于各民族和文明去补充、修正乃至更改和替代。但是，就像“现代性”是从西方发源一样，本丛书选择的这些颇具现代意义的观念，主要还是西方的产品，或者西方人对之有过特别的解释。

中国自19世纪上半叶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和冲撞以来，对西方开始还是只注意西人之“利器”和“长技”，继则更注意制度，最后则相当强调观念与思想理论。20世纪初，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知识人失去体制依托之后，更是纷纷奔赴国外寻求救国的新知和自己的新出路，哪怕一时不容易去大洋相隔的西洋，也赶到一衣带水的东瀛，故中国人接触的许多西方观念都是通过“日译”的转手。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西方观念都是先通过“日译”，后来则是通过不仅涉及名称、更涉及思想内容的“俄译”。“日译”提供其名，“俄译”提供其实，“日译”阶段尚称多元，“俄译”阶段已趋一元。作为我们先辈的阅读和翻译者常常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动员他人和大众力行。

“五四”时期，最著名的“观念先生”当推“德先生”（民主，De-

mocracy）、“赛先生”（科学，Science）两位。很快这些观念又被“革命”、“阶级”等观念遮蔽。后来人们又反省还应该有一个“莫先生”（道德，Moral）、“洛先生”（法律，Law）等等，类似的重要观念还有多少自可商议，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西方观念大举登陆中国已逾百年，深刻地激荡了20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参照西方的观念，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将不知如何说起。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积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制度之中。而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观念改变世界的变革例证不同，这里的许多观念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的。今天，我们大家对这些观念都已经耳熟能详，有的甚至成为我们响亮的口号，但是，对这些已经在深深影响我们生活的观念，我们是否真的了解或了解得足够深呢？我们是否真的对这些观念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反省呢？不断兴起的一代代年轻人在享受或忍受这原动力乃至主轴仍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否也愿意系统地来思考一下打造这些动力和主轴的关键词呢？

总之，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也许可以做一点回顾整理——回首一个多世纪来我们对这些观念的认识和实践。我们必须离得足够远才能对观念的成果或后果看得比较清楚。而今天当风暴的尘埃基本落定，我们也许的确有条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是故首先有编辑本丛书之议，我们想从西方经典作家那里重点选择体现在中国发生过巨大影响的西方文化核心或重要价值、又为国人文化迄今仍有所缺憾或需重新认识乃至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主题词编辑成书，首批分为两辑，一共30种。

具体来说，本丛书包括的观念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实质价值意义的观念，如平等、自由、宪政、法治、民主等，它们相对来说是西方特具的观念；一类是指称某一学科、理论的领域或实践、感受的范围的观念，如科学、音乐、婚姻、幸福等，它们自然为各民族所有，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西方人对之特殊的理解；最后还有一类初看不像观念，比如指称某一类人或某一地域的名词，例如哲人、知识分子、欧

洲、美国等，这些名词在西方人那里实际也已经形成独特思想的范畴，常常表现为一种自我或他者的镜像。

另外，这套丛书也可视作对一个翻译大国百年成果的回顾和利用。最早的思想作品的系统“中译”我们或可以严复的翻译为代表，称之为“严译”。但可能是受文言的限制，严复的译名虽然“旬月踟蹰”，相当精审，却大都没能留传下来，而是被“日译”的名称所代替。今天我们不必恢复“严译”的名称与文字，却可以考虑恢复和发扬颇具远见卓识的本土“严译”的精神。

我们这套丛书的定位是希望为中学程度的读者就能看懂的、主要面向大学生的通识读物，故选文不求文献总汇、学科专精或知识新锐，而只求经典通俗。在一般读者能读的前提下，遴选在西方思想中具有重要性或对 Society 有影响力的篇章。选文用原题或自拟题目的方式，不限体裁，包括讲演、对话、书信、论文、论著节选、散文、随笔等，乃至少量能鲜明体现这一观念的小说、戏剧节选。但即便如此，一种阅读的功夫和努力恐怕还是不可少的。而我们还希望可以借此给读者提供一条阅读经典的进路。

阅读经典有各种方法和进路。我们可以从某个我们喜欢的作者进入，可以围绕着某个领域来阅读，也可以围绕着某个时代来阅读。而我们还可以从观念着手，毕竟，所有的经典都是试图提出、阐述和传达某种观念的，而我们由观念入手，也可以集中注意经典中的基本观念，并巡视观念的历史，在一种交相辉映或互相辩驳中察看它们。但是，这套丛书毕竟只是一个编选，虽然我们努力挑选重要的观念和上乘的编者以保证质量和水准，难免还是会有疏漏，会受编选者的视野以至个人见解的影响，但我们深信，它一定还是能够开辟好学深思的读者进一步阅读完整的经典、系统把握那些深邃而有力的思想的道路。

2007 年 7 月于北京美丽园

编者序

李静

1

现代汉语的“幽默”，是林语堂先生以现成的古词，对英文“humour”所作的音译，有“风趣”、“谐趣”、“诙谐风格”等意。古词“幽默”大概最早见于屈原的《九章·怀沙》：“眇兮杳杳，孔静幽默”，系“寂静无声”之意。屈子创作《怀沙》时，正当悲伤绝望、“怀抱沙石以自沉”的前夕，那心情是与 humour 毫不沾边的。假设屈原有一点点 humour 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过端午节，我们所读到的他的作品，也完全不会是《离骚》、《九歌》和《九章》。但林语堂仍以“幽默”译“humour”了，他的缘由是：“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杂话》，载 1924 年 6 月 9 日《晨报》副刊）因此，逗笑而婉曲，是幽默最起码的条件。

“humour”的古拉丁语原型 humeurs 一词，系医学用语，意思是“体液、情绪”。体液理论乃由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医生所创立。他认为人

类有四种体液，分属于四种“本原”：黄胆属火（热），黑胆属土（冷），血液属风（干），黏液属水（湿）。人也基本分为四种体质。谁究竟属于何种体质，取决于他/她体内四种体液中占优势的那种。

正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先生所介绍：体液理论经公元2世纪古罗马的盖仑医生推进，到16世纪为法国的让·费尔纳尔医生（他与拉伯雷处于同一世纪）所修正，后被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王宫中的重要人物，与喜剧作家本·琼森（1572—1637）生死同年的罗伯特·弗拉德医生所接受，他在欧洲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有关“体液”的论战。在16世纪末的整个欧洲，“体液”这个词是颇为时髦且语义含混的。人们在日常使用时，多强调体液混合物的不稳定和不规则因素。在英国，“humour”则获得了古怪、怪癖、举止乖张之意。琼森是首位把“滑稽”怪癖与“幽默”进行语义联姻的剧作家，并借用“humour”一词创立了自己的“癖性喜剧”。这一幽默与笑的联姻，开辟了“幽默”的新时代。如今我们所领略的幽默艺术，其引人发笑的成分中仍活跃着怪癖、夸张、不规则、不稳定的意味，正表明了“幽默”的“体液说”血统。

琼森的“癖性喜剧”揭示了人具有双重性格这一事实。18世纪，“幽默”——伤感的乐观主义和快乐的悲观主义，这双面的阿努斯神——被认可为英国的一种民族特质，一种源于英格兰灵魂深处的传统。这一传统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将绝对化的仇恨悲哀转移至相对地带，而报之以悲天悯人的宽宥和戏谑自嘲的轻逸。我最叹服埃斯卡皮对幽默之于阶级暴力的解毒作用的分析。他指出，在中世纪末的英国，小资产者和农民联合起禁欲主义改革者罗拉德派，共同反对亲法国的金雀花王朝的最后几位统治者，可怕的阶级矛盾酝酿着流血的激情。但是，代代相沿的“英国灵魂”，能够辨证地包容各个矛盾倾向，人们渐渐演化出对立互补的政治集团及其各自的性格基调：中世纪“快乐”的保皇派、天主教骑士与“忧郁”的平民阶层，到18世纪演变为英格兰教绅士的完美乐观主义与卫斯理宗的热情庄严。时至今日，工党政策仍带有忧郁的卫理公会教义色彩，而保守派则继续“快乐英国”的古老神话。诚如埃斯卡

皮所言：

“相互矛盾的力量在英国却体现为琼森式的幽默，体现为这样一些人：他们颇具象征意义地集政治道德态度的全部怪异性于一身，并以某种礼仪喜剧式的礼节替代历史斗争的尖锐激烈。这些人若担任政府首脑，便成为英国政治中的出色配对。例如：以冷漠的格莱斯顿抗衡易怒的迪斯累利，以斯代福·克利普斯先生的严肃感伤抗衡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固执血性。

“在这个民族中，暴力的酝酿或许甚于任何一处地方，而对于幽默这一循环游戏的喜剧性意识，正是针对这种暴力的一帖最佳解药。

“由此，*sens of humour* 作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英国教养所传授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便演化为一种折中的基本条件，而英国人民的整个生活也正是建立在折中的基础之上。一个出色的误解（即本·琼森对幽默一词的误解。——编者注），促成了一个是非难定的领域，那里有如一处迷阵，循规蹈矩与奋起反抗共存，微笑与苦涩共存，认真与猜疑共存，同样，怪异情态也与正常心理共存。”

2

加拿大幽默作家里科克有言：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一部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更伟大的著作；而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在提高人类素质方面，要比纽曼主教作的颂诗《慈祥的光辉引导我们走出黑暗》贡献更大——纽曼只是在悲惨世界的阴暗中召唤光明，而狄更斯却把光明给予了我们。

同样，一部伟大的幽默作品也胜过一千本幽默理论。因为幽默理论只是在解释幽默，而幽默作品则把幽默直接给予了我们。正如 E. B. 怀特所说：“幽默固然可以像青蛙一样被解剖，但其妙趣却会在解剖过程中丧失殆尽。”因此之故，这本邀请你来理解和领会“幽默”的书，对幽默作品的择取多过了幽默理论。

如前所述，幽默是一种被文学所孕育的智慧。西方的幽默文学传统始于古希腊喜剧。喜剧出身低微——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它起源于宴乐游行之类“下等表演”的序曲。因此，除了在极少数“爱笑之士”那里，喜剧从未获得过和悲剧同等重要的地位。直至今日，幽默文学仍居于文学传统的边缘。其原因仍在于，它看起来不够严肃和深刻。另一个原因却是隐而不彰的：幽默乃是一种极少数人能够拥有的天才——最宝贵的事物总是数量最少，因此声音最弱。这才是人类的不幸。

在幽默的历史中，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创造了一个灿烂的开端。他辛辣的讽刺笑谑检验着一个城邦对自由的理解，《鸟》的奇思至今令人惊绝。自由和智慧使人在笑中反省，继古希腊喜剧诗人之后，古罗马的卢奇安、奥维德、阿普列尤斯、普罗图斯也纷纷加入笑者的行列。中世纪似乎是禁止笑的，但研究表明，民间狂欢节释放了被禁止的能量。文艺复兴时期若干文化精英的涌现，把中世纪的民间诙谐修成了正果，“笑”变得意味深长：薄伽丘创作《十日谈》，以“人”的解除禁忌的身体驱逐不会笑的神；伊拉斯谟疾书《愚人颂》，为人类的非理性狂欢和泛滥的热情正名；拉伯雷用《巨人传》跟教会捣乱，拿人类的片面严肃性开涮；塞万提斯在《堂吉珂德》里假装被劣质骑士文学所激怒，实则对脱离现实的僵硬理性作了绵长的反讽……这一时期的喜剧顶峰是法国的莫里哀，《伪君子》和《愤世嫉俗者》最被尊重，但要在极短篇幅里领略他的幽默天才，《强迫的婚姻》已足够。幽默在英国文学里的流淌最是浩荡：莎士比亚的幽默不但活跃于他的喜剧中，也渗透在他的悲剧和历史剧里；至于乔叟、本·琼森、康格里夫、斯特恩、菲尔丁，直至近世的狄更斯、萧伯纳……无不是制造各式笑声的行家里手，含笑的泪与带泪的笑、言语的尖酸与内心之温软的二重奏，萦回后世，不绝如缕。19世纪后半叶，马克·吐温之名响彻美国和世界，标志着“幽默”这一“英国灵魂”产生了更茁壮的变体。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西方人对理性和上帝的确信，现代主义的绝望幽灵与产生于智慧之自信的“笑”，发生了化学反应：荒诞派戏剧应运而生，贝克特托起一轮

“喜剧世界的黑太阳”，尤奈斯库可笑的废话散发着不安的气息。“黑色幽默”虽然由法国人布勒东和艾吕雅率先命名，但是它的成熟却在美国——约瑟夫·海勒、库尔特·冯内古特、品钦的作品让笑容变得沉重。好在还有伍迪·艾伦，电影大师的游戏之笔反倒带来了纯粹的智慧之乐。

对饱受专制之苦的民族而言，幽默则呈现出别样的色彩和力量。它不只是一种轻逸的趣味，更意味着精神的解放。19世纪开始，感情深挚的俄罗斯民族被幽默之光所照耀——果戈理的辛辣，契诃夫的温情，布加科夫的怪诞……让这个民族在悲伤的泪水中逐渐感知笑，以及笑带来的勇气与理智。在中欧与东欧，悖谬的现实孕育了哈谢克、贡布罗维奇、赫拉巴尔、哈维尔、克里玛们的幽默。捷克人把藐视荒谬、以幽默面对暴力、用装傻来消极抵抗的方式，称作“哈谢克式的”。正如作家伊凡·克里玛所说：“布拉格居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的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

可以看到，幽默文学传统在外向的想象力中，始终对禁锢和荒谬施以笑刑，而对自由与仁慈虔诚守望。幽默理论对此种本质进行了多重探讨。这种探讨还涉及幽默的诸种外延——喜剧、滑稽、诙谐、反讽、笑……克尔凯郭尔之于反讽，康格里夫、里普斯之于喜剧与幽默，柏格森之于笑与滑稽，弗洛伊德之于幽默的心理机制，巴赫金之于诙谐和自由的关系，昆德拉之于幽默与欧洲文明的关联，以及埃斯卡皮和克里奇利之于幽默的历史与哲学的研究……在幽默理论的历史中皆占有重要席位。解剖幽默固然缺少妙趣，但是它能让我们了解幽默与人类的精神根基之间的血肉关联。没有对幽默的解剖，我们很可能把它当做人类智慧无足轻重的小小饰品，从而犯下忽略的“罪行”。

3

20世纪以来，“幽默”开始成为中国人的哲学问题。“五四”先贤因

饱受皇权礼教的窒息，所以十分明了：幽默乃是人类智慧、自由和仁慈皆有余裕的产物，同时它也孵育和反哺它们。一个美妙的双向循环。正因如此，他们才要输入幽默的空气，以图改变这个民族专制蒙昧的精神结构。林语堂先生说得恳切：幽默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缺乏笑的能力，因此丧失了一个帝国……独裁者如果非装作愤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整个心性必都有错误……当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笑容时，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他们有的是枪炮啊……”“幽默的人生观是真实的、宽容的、同情的人生观。幽默看见人家假冒就笑。所以不管你三千条的曲礼，十三部的经书，及全营的板面孔皇帝忠臣，板面孔严父孝子，板面孔贤师弟子一大堆人的袒护，维护，掩护，维护礼教，也敌不过幽默之哈哈一笑。”

西式的幽默便是这样被作为礼教的敌人而引进国门的。于是，现代中国有了鲁迅式的幽默，然而它沉郁有余，轻逸不足；有了老舍式的幽默，然而它失之油滑，不够质朴；有了张天翼式的幽默，然而它太过单调，缺少色彩；有了钱锺书式的幽默，然而它流于尖刻，不见暖意……幽默的内在双重性还未被现代中国作家所领会，他们能够做到的只是单面的讽刺、逗笑与滑稽。幽默在中国真正的成熟，是在当代作家王小波身上——他把笑与绝望、智慧与荒谬的对立共存表现得如此之妙，堪为马克·吐温、约翰·欧文的精神嫡裔。

幽默是假正经的天敌。当一个民族的僵硬礼教在笑声中消亡，寄身于它的假正经却仍可能金蝉脱壳，以其他形象从事更别致的统治——套话、决议、号召、禁令、欢呼表态、苦情感恩、道德典型、媒体明星……随着传媒时代的来临，假正经更要尽可能占据公共的和私人的、官方的与民间的一切空间，强化人的童稚状态，压抑人的怀疑精神，维系禁忌与恐惧的威力，由一群不会笑的人操纵和塑造另一群不会笑的人。

后人须得感谢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创造了“agélaste”这个词——

“仇恨笑、不会笑的人”。这是西方赐予“假正经”的不朽称谓。神权时代，“假正经”体现为神权和教会的绝对权威性，但在受到法律保护的民间狂欢节上，民众却拥有肆意嘲笑教会权威的神圣权利。这就是西方的智慧——统治者懂得“笑”与“假正经”的能量守恒定律，也懂得对威权的屈从若不释放为周期性的公开嘲谑，便会转化为不定期的暴力流血。《巨人传》是纸上的狂欢节。拉伯雷用高康大、庞大固埃、巴努日们变幻的身体、荒诞的经历、放肆的言笑和佯谬的探讨，消解神权和教会的假正经。这是一种受到准许的放肆权，然而自由的魔瓶虽以臣属的礼节打开，却再也无法以臣属的礼节封闭。自由的笑声一如空气，弥漫于整个欧洲，弥漫于后来的一切世代，弥漫于东西方智者的强大肺叶里，并经由他们，启示那些不安的民族之魂。这是幽默诙谐的拉伯雷所散发的无力之力。

巴赫金曾如此评价诙谐的伟力：诙谐不仅把人从外部的书刊检查制度中解放出来，而且首先从正宗的内部书刊检查制度中，从数千年来人们所养成的对神圣的事物、对专横的禁令、对过去、对权力的恐惧心理中解放出来。诙谐是对恐惧的胜利，使人的意识清醒，并为他揭示了一个新世界。

其实，不自由的人们原本知道，诙谐、幽默、喜剧、笑……并非专为捍卫自由而生，它们不过是自由意志的自然产物而已。不自由者将其视作武器和良药，或者相反——将其视作虚饰和麻药，均有乖离之处。如果“幽默”能够说话，我猜她宁愿声称自己是一种哲学或美学，一种艺术和人生的态度与趣味。她敏感于世界的无可解救的对立、不谐与荒谬，却超然地报以谑笑与同情的双重感情。幽默家的超然绝非由于他/她不在此境遇之中；相反，他/她深陷其中且深味其苦，却仍能冷眼旁观，跳出局外，诱使他人发出忧郁的微笑。这种哲学式的超脱正是幽默的高超之处——她既浓烈又无力，既严肃又滑稽，既深植于个人意识之中又超越于个人哀乐之上。我毫不怀疑她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她不可被我们指望去直接改变人类的处境，却能够在人类意识的漫长的